



投稿邮箱:ntbyfk@163.com

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主办 南通报业传媒集团承办 南通市作家协会协办

# 张謇与天生港电厂(下)



1921年春,天生港电厂基建工程在大达后街开工,标志着天生港电厂的建设正式启动。根据1921年3月3日《新闻报》,预定的工程进度是:“三月动工,五月电机到,六月引擎室建筑竣工、动手装机,七月锅炉管子到通,八月厂房完工、装锅炉,十一月全部机器装毕,十二月试机,民国十一年一月开始送电。”根据大生档案中《电厂辛酉年工程材料机器及各项开销银钱帐略》记载,1921年天生港电厂购买钢条、水泥、黄沙、石子、砖瓦、石灰广木、桐木、洋松、白铁、柏油、白漆等多种建筑材料,购置钉子、铰链、插销、玻璃、螺丝、铅丝等配件,建造机器栈房、厂房、烟囱、物料所、办事处、厕所等生产、办公、生活用房。

1922年初建成发电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。近代南通工业企业的陆续设立,是在大生纱厂的基础上,主要依靠已有企业的资金投入和引导,不断滚动发展的。天生港电厂是在大生企业不断获利的背景下筹建的。据《大生系统企业史》,大生一厂、大生二厂1919年、1920年两年,利润率达90%以上,其中1919年大生一厂为105.78%,大生二厂113.2%。1922年起大生诸企业陷入困境,债台高筑,自身尚且不保,无力再拨款支持天生港电厂的建设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六月一日,张謇给上海华发实业公司的管趾卿写了一封信。上海华

发实业公司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销售代理,其广告称“西门子厂驻华代表”。由这封信可知,西门子生产的发电机(托朋)1921年已经全部运抵上海,除了小部分运到南通外,其他都暂时存放在栈房。张謇“顷承见示某处急需此类托朋一座,南通既不待用,正可分出一座让予先用,以缓急,实属两便”。但张謇对于天生港电厂没有彻底放弃,只是打算暂时出让发电机一座,“惟原有关合既不取消,则此次让出之托朋一座,自应仍由贵行补运来沪,以符原数。补交时期以十个月为限,在民国十二年三月底以前必须将全部补交清楚,幸勿迟误”。张謇希望通过腾挪,换取时间,指望赢得转机。然而事与愿违,1947年《南通天生港电厂》痛惜地回顾:“垂成厂房,被迫停工,到沪机器,亦以无法付款而不得不转让与昔戚墅堰震华东厂;麻款七十余万,未能完成,良可扼腕。”

1925年,大生一厂的债权人上海银团派李升伯到南通,考察大生企业的实际情况,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。李升伯到南通后,与张謇进行交流,并在张謇的安排下参观张謇所创的事业,足迹从南通一直到东台。李升伯制定一个在大生一厂不破产的基础上的厂务改革计划,根据他在1985年手书的回忆,内容包括:请求老债权人允许一千万老债停息还本;引用日本人纺织厂的科学管理,手脚并用,改良三十几年的旧厂;引用成本计算作为吸引借款资料;赎回大生副厂,并添办布厂;设立天生港大电厂减轻动力费用;引进纺四十支纱的美棉种子;试行改八小时制。天生港电厂的建设再次提出,成为复兴大生一厂的措施。这应该是张謇的电厂设想,得到李升伯的认同。

□朱江

1931年11月28日,大生一厂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召开股东常会。经理李升伯没有与会,但他之前(11月21日)致函董事会,提出改良机械设备和规建电厂的建议。李升伯认为:“旧有之原动力运动力小,燃费滋巨,不独逐年消耗过当,且于改良发展上发生莫大之阻力。”李升伯呼吁,尽管目前企业负债累累,但在失去土产土销这一本地市场优势的情况下,如果固守旧有藩篱,不进则退。李升伯在附上的《规建电厂案》中,真情回顾当年张謇始创天生港电厂的情景:“张前总理本有规划电厂供给通海各工厂需要之企图,目光远大,诚足令人景仰。惜乎事业未就,半途停顿,良可扼腕。”李升伯还描绘电厂建成后的远景:“仅以一、副厂言之,每日即可省燃煤斤五十吨,通年计省银十五万两。此外所余电力尚可分给其他工厂或电灯公司之用。不特此也,当地打米、榨油、织布,一切小工业亦将陆续兴起,尚有附带收入。故为本厂未来节省计,为发展地方工业、宽裕民生计,则规划电厂实为迫不容缓之图。”

在李升伯的主力下,大生董事会通过规建电厂的计划,并与上海银团达成协议,依旧在天生港重新建设电厂。经过勘察,天生港电厂选址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通靖轮埠码头西侧空地30亩。订购英国拔伯葛25吨锅炉两座,德国葛益吉厂5000千瓦发电设备一组。1934年底,天生港电厂发电,由22000伏输电线路,从天生港经唐家闸输送至城区,再由城区延伸到江家桥大生副厂。张謇的电厂构想,通过李升伯——这位真正理解张謇宏愿的企业家的接力,至此终于得以实现。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

南通大剧院 □许 聰

## 陪女儿练琴

小区里,有一家器乐业余辅导学校,每到周末,教室里便传来各种器乐悠扬的声音,宛如一个小乐队。每次听到这些声音,我都会停下脚步倾耳凝听。我对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了,它让我心生感动和感慨,我的思绪穿越时光隧道,一下子回到三十年前,女儿学习钢琴的情景是那么遥远,又那么贴近。

那一年,上海的一位朋友要给孩子买台钢琴,打听到南通生产的“黑桃”钢琴,而他知道我与“黑桃”钢琴厂厂长关系不错,就请我帮忙到厂里挑选一台。厂长亲自带人到仓库挑选,同时撺掇我给女儿买一台,他眼睛看着工人装车,嘴里慢吞吞地说:“穷养儿子富养女,女孩儿从小就应该在艺术熏陶中成长。孩子将来不一定能成为钢琴家,但在音乐里长大的孩子,素质绝对差不到哪里去。”

于是,我把“黑桃”钢琴搬回了家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年女儿四岁,一个像刚刚出土的禾苗一样葱绿的年纪。从那时起,枯燥与充实、得到与失去、痛苦与快乐、期望与等待,种种矛盾冲突,涌向女儿的童年生活,也折射出我这当父亲的,在对待女儿教育问题上期盼和焦虑甚至烦躁的复杂心理。

平心而论,对于学钢琴,女儿是没有心理准备的,一个刚上幼儿园的稚童,对这个世界除了好奇,还是好奇,一切的成长之路,都是父母的安排。当我们把沉重的钢琴搬到二楼,它庞大的体积几乎占据房间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在一旁擦汗,女儿瞪大眼睛好奇地打量这庞然大物。她并没有意识到,从今往后,她的童年将失去许多笑声,失去在野地里奔跑跳跃的时光。

从那时起,每天晚上,二楼狭小的空间里就响起生涩、迟疑的钢琴声,琴声透过窗户,在楼道里回旋。我知道,每天听这样枯燥的琴声,对左邻右舍是一种折磨,不过,大家还是以宽容之心接纳了女儿对他们的折磨。所以,每当在过道与邻居相遇,迎面一句“女儿开始练琴了吗?”我都笑笑,以此表达歉意。其实,这样的折磨何止是左邻右舍,家长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曾经,我梦想,到女儿琴艺初成之时,老爸我泡一杯清茶,燃一根香烟,让女儿弹一首曲子,我微眯双眼,在纯净明亮的琴声里假寐;或者,请三五好友相聚,

让女儿即席弹奏,在亲友的啧啧赞赏里,我矜持地笑着……

而这样的幻想,在每天的枯燥陪练中被磨灭。

我常思忖,作为父亲,在日常生活里,我还算是慈父吧,但在陪女儿练琴过程中,我绝对是暴君。我没有循循诱导的方略,又没有耐心细致的心性,除了每天晚饭后守时守刻地把她按到琴凳上,然后就是大声呵斥,指责她的种种失误,完全不懂得,鼓励和表扬是通向成功之门的金钥匙。女儿现在性格柔弱,说话细声细气,人都说她是淑女范儿,我不知道这跟她学琴接受音乐熏陶有没有关系,更不敢肯定是不是我厉言训斥造就的。我只记得,每次我大声训斥:“手指立住”“慢,再慢,还要慢”时,她都像小猫一样怯生生地瞧我的脸色,从来不辩解,不抗争。

那时的气候,冬天比现在冷,夏天比现在热,家里没装空调,热时热煞,冷时冷煞。冬天,我在她脚下放只热风机,把她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放在怀里捂捂,呵呵热气;夏天,我高踞在椅子背上,一手指点琴谱,一手为她掌扇。通常,我手边会有一把裁缝尺子,听到不协调音时就把尺子在椅背上敲得“啪啪”响,并威胁她再若犯错,定打手心不饶,而那把芭蕉扇,则是我发怒时拍打她脑袋的刑具。在很长的时间里,当女儿对某事不能理解时,我调侃她小时候一次发高烧烧坏了脑袋,不聪明了,而她总朝我翻一下白眼,回道:“是被你用芭蕉扇拍脑袋拍笨了的好吧。”那时,她被我责骂和责打之后,一声不敢吭,默默地在琴键上移动手指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这情景,让我心很疼,很想把她抱到怀里安慰一下。

尤其是在练琴休息期间,看到她趴在窗口向外张望,看同年的孩子跳绳、捉迷藏、丢手绢,眼里流泻羡慕的神情;或者,在隔壁邻居孩子向大人撒娇、小的大的笑闹一团的时候,女儿只能孤寂地在窗玻璃上呵气,在上面画圆圈,画图形,这图形,也许是她内心深藏着的美丽梦想,也许是她幻想重回童真童趣自由天地的诉求。每当时,我自问:孩子应该有孩子的天地,我这么残忍地剥夺了女儿的自由,这当然是一条成长的必经之路吗?再说,女儿不见得就有钢琴天赋,让她如此刻

□黄俊生

意地走这条路,难道不是家长情绪化的选择吗?

此时,会有另一种声音在驳斥我:傅聪不是也没有钢琴天赋吗?他老子傅雷不是也严苛地监督儿子练琴的吗?傅雷在楼下写作,一旦听到楼上琴声停歇,立马冲上楼暴跳如雷,巴掌伺候。于是,我给自己鼓劲:不经历凛冽寒风,就没有春花含笑。

练琴的过程是痛苦的,枯燥的,这过程,不仅是对孩子意志的磨练与考验,更是对家长恒心的磨练与考验,谁能坚持下去,谁就能笑到最后。我上海那位朋友的儿子,在练习了四个月后知难而退,钢琴放在家里蒙灰,与我女儿差不多时候练琴的孩子,有不少也放弃了琴童的理想,他们不是输在起跑线上,而是面对漫漫练琴之路失去坚持的信心和刻苦的毅力,不是说在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,但至少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岁月里能耐得住寂寞,能以最大的隐忍力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

女儿在琴童之路上付出很多,也收获很多,跟着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寻访名师,与当时已有小名气的琴童王鲁交流,殷承宗演奏会上被选为献花琴童,克莱德曼的见面会上登上舞台与他合影,参加全省钢琴考级优秀考生巡回演出,等等。更重要的是,她在长期的学琴过程中,寻找自信,自励,自立。在通过了钢琴考级十级的那年,她拒绝了我们让她放弃钢琴而专心中考的建议,坚持每天两小时练习,把目标锁定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,每两周去南京师范大学请管科亚教授辅导。那时,我们已经换了新居,第二台钢琴也搬进了家,一个琴童的艰苦旅程之上终于铺满鲜花。

一个在我们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,如今已为人师,为人母。女儿南师大毕业后,考进一所中学当了音乐老师,受朋友请托业余时间辅导他们孩子学习钢琴,这些孩子,重复着女儿当年的经历,接受与女儿同样的磨练与考验,前面的道路,未知而又充满期待。直到今天,我还没有实现让女儿为我弹一曲的梦想,也还没有邀请好友举行家庭音乐沙龙。但这不要紧,能亲眼看着、陪伴着女儿一步步成长,这是一种幸福,我心生欢喜,溢满自豪。

而我,也在这陪伴中成熟与深刻起来。

## 我与讲座

□杨 谳

“如果能在大礼堂给上百人做讲座,那该是一件多么神圣而荣耀的事啊!”很早很早的时候,我曾这么想。在谈恋爱时,有一日与女友共同憧憬未来,其中有一个,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高高的讲台。

我做的第一个讲座应该是在通师二附那一次,听众是小学五年级学生——我女儿的同学。事前,校领导请人带话说:“多讲自己是怎么用功读书的,不要讲自己顽皮捣蛋的事。”据说此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真实的笑话:某次考试,有一道填空题:请举出五位南通历史上的文化名人。有一学生在“张謇”之后填上了“杨谔”,老师在“杨谔”旁批道:

“那个人还没死,现在不能算。”

最难忘的讲座是回到母校海门师范那次。当年的老师都说不认识校友杨谔其人,等我露了面,纷纷说:“噢——原来是他,特别调皮的那个,不是叫杨徐辉吗?”也许他们是在心里还说:“差生一枚呀!”那天出发前,妻子特意让我换了身新衣服,还开了辆新车。

最窘迫的一次讲座是在淮安。那一年我在徐州沛县办个展,半个月后去撤展,淮安书画院的朋友知道了,嘱咐我回南通时在淮安停留一天,作一个草书讲座。当晚,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,我准备了讲座提纲。第二天开讲时,发现台下竟然有十多位已经成名的中青年书画家朋友,他们个个书艺高过我。我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?其窘可知。

最为刺激的一次讲座是在厦门。那次是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,组委会安排我作一个讲座并签名售书。我孤身前往,当然更不可能组织亲友团什么的。讲座时间40分钟,如果自己不能一开始就吸引住川流一般的观众,极有可能出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台上自说自话的囧状。幸好那天热情观众不少,至挥毫示范环节时,场面堪称热闹;最后签名售书,又弄得超时。工作人员没法,只好上来请我们移至舞台一角,以便下一个节目登场。

最让我失望的一次讲座是在某高校。刚走进阶梯教室时,看到黑

是同村的富人家也没能做到的。

到了我的下一代,生活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老一辈的教育理念没有“失传”,每个孩子都是从学前抓紧教育,吃苦学习,所以我们比他们更上了一层。

大儿子鞠明,参军转业后读医校,现是医院主治医师。女儿鞠亚玲,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大学,毕业后分在总参工作,转业在首都央企。小儿子鞠健夫,南师大毕业,在扬子晚报社工作。三人都是党员。每家各有一个孩子。

大儿子的儿子鞠辰,上海交大研究生毕业,单位派驻国外做贸易工作。

女儿的女儿张露小荷,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毕业回国、清华大学研究生、书法家、中国青年设计专家、中国青年设计领袖,现任中国中铁置业集团副总。

小儿子的儿子鞠小夫,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大二在读生、钢琴家,多次荣获国内外比赛大奖,曾跟随李岚峰总理演出多场,江泽民主席接见过他。

我常对在国外的两个孙子说:“无论你们走到哪里,都不能忘了你们是中国人民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祖辈头上的三座大山,否则既没有我们,更没有现在的你们。所以你们学业结束,要回国,为祖国服务。因为你们都系着一条中国根,而这条根,系着你、系着我,归根结底,这条主根就是在中国南通农村这座小小的茅草屋里生长的。不管穷富,祖辈们能把这条根认真培植,细心滋养,代代传承,给了我们成长的力量。所以别看这座不起眼的茅草屋,它在我迢迢的人生旅途中,一直陪伴着我们,教育着我们,鼓励着我们几代人跟着共产党走,不断前进。也正因为这座茅草屋里的‘家训’味道醇厚,所以才能永远储藏在我们的心里,希望这个优良传统,一代代传承下去,不许失传。它是构成了我们全家世世代代每个成员履历中不可缺的一页。

压压三百多名学生,不禁心潮澎湃。随着讲座的进行,发觉许多学生虽然不是低头玩手机,但明显心不在焉。讲座结束,我站在讲台上回答几个学生的提问,抬头见听讲者手持小卡片鱼贯而出,教室门口,有守候在那里的学生往那卡片上盖戳。我问:

“这是干嘛?”一生答道:“盖上了章,才可以计学分。大多数人对听讲座并不感兴趣,只是为了学分。”

我还经历过一次在吵闹声中结束的讲座。那是一个系列讲座,共六讲,那天讲完专业知识后,几位听讲者希望我用笔演示。此举为何?彼此心知肚明。在连续书写了几张作品并现场送人后,我宣布不能再写了。这时,一个一直在人圈之外观望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,坚持要我为他也写一张。我说已经说好不写了,他固请。旁边有人上前问他你是哪里的?怎么从没见过你?那人就突然冲我破口大骂……

也曾做过几个似乎颇受欢迎的讲座,事后有人建议我干脆一鼓作气,整出几份讲稿,主动出击,把讲座当做产业来做。我无此“雄心”,也无此能耐,一笑而已。

做讲座,也常去听讲座,很多年前在北大和南大听过多场高水平讲座,简洁、朴素,凭学术和思想说话,真是“惟大英雄能本色,是真名士自风流”。近几年,各地讲座风靡,据说还与评选什么什么挂钩。有几次,组织者见听讲的人不多,连连致歉,说是没组织好。我的想法是:做讲座不能“扰民”,还是“愿者上钩”为妥。如果静下心来回顾那些形形色色的讲座,至少一半可以不办,如今货真价实,对听众确确实有益的讲座其实并不多。

粗略地估算一下,我前前后后做过文化讲座恐怕不下50场。如果有人问:“现在最乐意做的讲座是什么样的?”那么我会告诉他:“我最乐意做的那些不是讲座的讲座,不拘地方,不必盛装,不要仪式和主持,听者一二人、三四人也可,我都愿意。”粗略地估算一下,我前前后后做过文化讲座恐怕不下50场。如果有人问:“现在最乐意做的讲座是什么样的?”那么我会告诉他:“我最乐意做的那些不是讲座的讲座,不拘地方,不必盛装,不要仪式和主持,听者一二人、三四人也可,我都愿意。”

就像木心当年在纽约给陈丹青他们讲课一样。